

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中国农村政策  
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中国农业大  
学“211工程”、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  
与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资助

发展学专业系列教材

# Methodologies of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Studies & Practices

*Applic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ject Planning & Manage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for students/trainees/field workers)*

## 参与式发展 研究与实践方法

——在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及组织发育中的应用  
(学生/学员/项目工作者用书)

李 鸥/编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发展学专业系列教材

# **M**ethodologies of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Studies & Practices

*Applic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ject Planning & Manage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for students/trainees/field workers)*

---

## 参与式发展 研究与实践方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在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及组织发育中的应用/李鸥编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0  
发展学专业系列教材 学生、学员、项目工作者用书  
ISBN 978-7-5097-1528-4

I. ①参… II. ①李… III. ①农村经济-发展经济学-研究  
IV. ①F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2223 号

· 发展学专业系列教材 ·

学生/学员/项目工作者用书

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

——在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及组织发育中的应用

---

编 著 / 李 鸥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mailto: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责任校对 / 刘雨薇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9.5

字 数 / 502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ISBN 978-7-5097-1528-4

定 价 / 69.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再论“参与式发展”与 “发展研究”（代序）\*

叶敬忠

1998年，由中国农业大学提出设立的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第一次被教育部列入高等教育的专业目录，当年，中国农业大学成立了国内第一所农村发展学院（后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合并为人文与发展学院），此后国内很多高校也相继成立了农村发展学院。中国农业大学提出设立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的建议可以追溯到1988年在中德合作“综合农业发展项目”基础上成立的“综合农业发展中心（Centre for Integra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CIAD）”，也就是很多国际机构所熟知的CIAD。综合农业发展中心成立后的两年内，一批刚从大学毕业、以自然学科为主要背景的青年工作者投身于当时国家倡导的黄淮海地区的农业开发与农业推广；并在此期间接触到了德方专家带来的“区域农村发展”（Regional Rural Development -RRD）和“综合农村发展”（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IRD），以及“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 interdisciplinary）和“参与式”（Participation）等概念。随后，综合农业发展中心的成员陆续被送到欧美的大学学习发展类的学位课程或参加高级培训。自1994年开始，这批在国外学习了“发展”的年轻人逐渐活跃在国内开展的众多国际发展合作项目的舞台上，其主要任务是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包括项目基线调查、可行性研究、社会经济评估、项目实施与管理、研讨培训等。在1988年开始的发展际遇、发展培训和发展实践经历与积累的基础上，1998年成立了农村发展学院，并把农村区域发展以专业的形式引入了中国

---

\* 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我就有关历史和观点与李鸥教授、王伊欢教授、齐顾波教授、徐秀丽副教授进行了讨论，很多方面得益于这些讨论；另外，潘璐博士帮助查阅了部分文献资料，在此一并感谢他们。

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回顾这一历史过程，我们也许可以发现，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的成立正是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所说的“发展的专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sup>①</sup>”过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这与拉美和非洲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别无二致。

1998年开始的农村区域发展教育，主要还是将此前10年所积累的发展实践工作的理念、技能与方法进行总结，并以高等教育的形式进行知识传播。这些知识深受二战后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实施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工作的影响，也许可以说，开始阶段我们所传播的知识主要还是围绕着如何从事发展实践特别是发展项目工作。在这一知识体系中，“参与式”是被反复强调的概念，也是多年来CIAD人开展农村发展工作的核心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CIAD和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现人文与发展学院发展管理系）在将参与式发展理念引入中国<sup>②</sup>，并使之主流化的过程中做出了毋庸置疑的贡献。目前在中国开展的国际项目以及很多公民社会组织中，“参与式”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工作话语，这其中有CIAD人的诸多功劳，而李鸥教授可以称得上是CIAD人中的先锋和代表。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李鸥教授从事发展实践和发展项目工作近20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农村，所从事的项目涉及绝大多数在中国开展发展合作的国际机构，他在参与式思想的落地生根过程中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和不减的激情。在李鸥教授参与规划和实施的农村发展项目中，农民的声音得到了较强的表达，农民的需求得到了较多的体现，农民的利益得到了较好的保证。为此，李鸥教授也许还招致了个别地方行政官员的不满和不屑。若说李鸥教授是农民的代言人也许不为过。1994年在某县执行某国际发展合作项目的社会经济评估，时逢国内农民卖粮难的问题。有一次，从调研村回县城住地的路上，遇见路旁很多农民在粮站前排长队售粮，李鸥教授见状即呼停车，了解民情后愤责粮站违背国家政策，给农民售粮制造更大的困难。时至今日，每每忆起，其情其状，犹历历

① Escobar, Arturo.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② 参与式思想在中国有很深远的历史根源，如“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知屋漏者在宇下”，“欲知山事事，须向打柴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等等，这些说法都体现了明显的参与式思想。1943年，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更是参与式思想的突出体现。

在目。

自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成立，又过去了十余年。在此期间，发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已经在丰富的发展实践与发展项目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基础上初具雏形。我们的教育和研究在以往的实践工作理念、技能与方法之上，又加入了更多的社会科学的反身性和批判性视角；在以往形而下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更多形而上的成分；在以往职业导向的课程设计基础上，又加入了更多的研究导向的内容。可以说，我们正在从发展实践教育向一门较为成熟的发展研究学科迈进。也正是值此时刻，我们方能对发展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世界范围的回顾，并对参与式发展进行必要的反思，这些带有批判性的思考反过来又可以对我们过去 20 余年的发展历程有更好的理解和把握，也可以找到世界范围内的发展与发展研究的思潮变迁在中国所留下的印记。

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研究的创立与形成大约可以界定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亚非国家的新近独立以及国家主导型的民族-国家发展，落后国家寻找民族振兴路径的雄心与决心带来了发展研究领域的兴起与蓬勃。在这一时期，发展研究体现出了作为政策科学的性质，它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提出支持性的发展思路。随着“以经济增长作为发展”这一发展思想招致的批判与崩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展研究的对象范围从经济增长、消除贫困、宏观经济、社会政策等传统的研究议题不断扩展到了国家体制改革、公民社会、民主化、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性别与发展等方面，为整体性的社会发展提供知识支撑是发展研究的新要务。然而这一时期，发展研究作为一个专门学科的思想视域却陡然变得狭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学科霸权为发展中国家的所有落后问题开出了“双赢式”的政策药方（Bernstein 2006）<sup>①</sup>，只要遵循这些发展理念、使用特制的发展工具包，“增长”与“再分配”之间的长久矛盾就可以被消解，所有人都可以从发展中获益。这些政策思路无视、甚至刻意掩盖了发展中国家各自的资源禀赋、不断变迁的社会动态、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于是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将这样的发展理念称为

---

<sup>①</sup> Bernstein, Henry. 2006. Studying Development/Development Studies. *African Studies* 65 (1): 55.

“发展教条的‘去政治化’”<sup>①</sup>。

参与式发展便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至今一直活跃在农村发展领域的一剂政策药方。参与式发展的成形源于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的坚持不懈的倡导和推动。他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并多次再版，其中包括《农村发展：以末为先》<sup>②</sup>、《挑战专家：农村发展前沿》<sup>③</sup>、《谁的现实有价值？以先为末》<sup>④</sup>，等等，以及许多版本的、不同语言的快速农村评估（Rapid Rural Appraisal-RRA）和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的讲义和小册子。钱伯斯于 1993 年首次在中国昆明举办 PRA 培训班，并从 2002 年开始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聘请为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可以说，钱伯斯的参与式思想影响了中国农业大学原农村发展学院及 CIAD 的一大批人，李鸥教授的这本书就是很好的例证。

钱伯斯所提倡的参与式发展最初始于 RRA 工具的使用，这些工具能够在发展项目的规划过程中，特别是在项目基线调查中很好地利用当地农民的知识或乡土知识。他认为这些工具和方法的使用能够带来快速的、低成本的以及可靠的结果，同时 RRA 工具的使用还促使当地人直接参与到问题分析过程中，由此，钱伯斯又将 RRA 改版为 PRA，并将“参与”从一种农村调查方法提升为一种对地方人口赋权的手段，从而使得“外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由上下关系变成了伙伴关系，即他们之间权力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后，参与式发展的话语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成为国际发展机构以及一些国家政府官方话语中的重要部分，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藉由其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援助继而将这一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强力推广开来。

此后的十几年间，参与式的实践方法与理念受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作者的推崇——参与式方法在发展中国家的大专院校和发展机构中迅速普及，举凡发展项目必定采用参与式的方法，参与式之于发展工作者无异于指导行

---

① Ferguson, James. 1990. *The Anti-Politics Machine: "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② Chambers, Robert. 1983. *Rural Development: putting the last first*. Harlow: Longman.

③ Chambers, Robert. 1993. *Challenging the Professions: frontiers for rural development*. London: IT Publications.

④ Chambers, Robert. 1997. *Whose reality counts? putting the first last*. London: IT Publications.

动的红宝书。然而,在经历20世纪90年代参与式发展的风靡和热评之后,当我们审视这十几年间农村发展实践领域走过的丰富历程时,参与式发展隐含的“去政治化”取向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下逐渐暴露出了它作为一种发展理念的缺陷和不足。西方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参与式发展的反思,并出版了与“参与式发展”数量相当的“质疑参与式发展”类的书籍和文章,如由比尔·库克和乌马·科塔里(Bill Cooke and Uma Kothari)主编的《参与:新型专制?》<sup>①</sup>收录了很多著名学者的批判与反思性文章。格林·威廉斯(Glyn Williams)2004年在《第三世界季刊》上发表了“评估参与式发展:专制、权力与(再)政治化”<sup>②</sup>,对这些反思参与式发展的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梳理和总结。

威廉斯(2004)认为,钱伯斯将参与式从实践工作方法向“赋权”层次进行的提升,是与发展的主体变迁相呼应的——通过“参与”的方式将那些先前被排斥在发展项目之外的边缘群体包容进来,使穷人成为决定地方发展和自身生活的重要主体<sup>③</sup>。而问题是,过于强调和依赖参与式的实践方法能否实现“上”与“下”之间权力关系的实质变化,使处于“下”位的真正草根阶层成为发展的主导者?从很多地方的农村发展实践来看,这种设想至少是有些理想化的。参与式发展过度强调个体的参与和变革对社会变迁的作用,而忽视了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间的政治冲突与对抗;强调和塑造了一个“社区”共同体,而模糊或掩盖了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差异性,虚化了社区环境中动态变化着的分化与分层。不仅如此,每一个微小的地方社区的变迁发展总是与更宏大的国家政治经济架构相联系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一个小村庄的命运都已经或多或少地被卷入了自由资本的全球化运作之中。同样的问题是,过于强调和依赖“去政治化”的参与式发展能否真正撼动村庄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不可否认,参与式发展的确对那些先前被边缘化的群体(穷人、妇女)敞开了进入发展项目的大门,但却是通过将

---

① Cooke, Bill and Kothari, Uma. 2001. *Participation: the new tyranny?*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② Williams, Glyn. 2004. Evaluating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tyranny, power and (re) politiciz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5 (3): 559.

③ Williams, Glyn. 2004. Evaluating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tyranny, power and (re) politiciz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5 (3): 560.

他们更结实地绑缚在另一种话语权力结构上的方式来实现的。在参与式发展这种有意识的、强大的话语结构中，随着社区与村民被赋予发展的主体角色，“参与”与一种软化的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发展项目的成败责任也从发展机构转移到了参与者身上（Williams 2004）<sup>①</sup>，“上”与“下”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参与”既是一种话语意识的霸权，同时它也在经历着地方群体的解构与重塑。对当地人来说，“参与”究竟在他们生活中占据多大的比重和分量？我们有大量的农村发展实践可以说明，村民对发展项目的参与从一个更广的意义上来说恰恰是服务于他们自己的“生活项目”，村民建构自己生活世界的能动性和社区环境的复杂多样绝不能被忽视和低估，任何对参与式发展抱有理想化的、浪漫主义预期的实践工作者毫无疑问都会陷入巨大的失望。同样，发展不是一次性的、立等可见的过程结果，如果将一个社区的发展变迁寄希望于几次短暂的村民“参与”，那么“参与”只能是发展工作者乐此不疲的游戏，如果是这样，参与式发展如何能带来社区群体所期望的生活愿景？

但是，威廉斯（2004）也承认，参与式发展无论是作为一种理念的设计还是在发展实践的方法应用中都有无可取代的优势：它在发展项目的实施者与接受者之间建立起一个语言共同体<sup>②</sup>，它对地方知识的重视、对地方群体参与意识的激发不仅挑战了“自上而下”的指令性工作方式；从长期来看，参与式发展在唤醒公民权利意识、培育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方面也有着行动上的重要启蒙意义；而后者最终会导向以人民为发展主体、通过地方性的组织网络解决发展问题的“另一种发展”。

对参与式发展的反思本身就是发展理论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参与霸权、参与工具化、参与游戏化……各种反思与批判在该理论产生之初就相伴而生、接踵而来，或是不断修正这个理论，或是产生新的替代增长点。通过这些反思，我们认识到，仅仅依靠自下而上的“参与”的确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强调“协助者”的角色和作用是很关键的。我们这个社会非常缺乏

① Williams, Glyn. 2004. Evaluating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tyranny, power and (re) politiciz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5 (3): 565

② Williams, Glyn. 2004. Evaluating participatory development: tyranny, power and (re) politiciz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5 (3): 572.

“协助者”这样的意识和能力，而且如何做好“协助者”，这实际上比做高高在上的领导或专家要难得多。社会的转型最终将取决于普通民众的意识和认知倾向，因而，关于“协助者”的教育和能力建设仍然是很关键的。而在将参与式方法与社区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工作者对于促进更好的参与可以起到核心作用，可以承担起很好的“协助者”的角色。在这个意义上，李鸥教授的这本书作是非常及时的，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作用。全书从概念、工具和方法途径三个层次详细介绍了参与式方法，介绍了参与式方法在社区和组织的发展规划与管理、项目的规划、实施、管理与监测评估全过程中的应用，更可贵的是结合作者多年来从事发展实践工作的丰富实例进行全面细致的方法讲解。在详细展示参与式的各种方法工具的同时，本书特别强调了“协助者”的角色，他们不仅是参与式方法的掌握者和实践者，更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助力者。从如何进入社区、如何与当地人交流互动到实践活动中言行举止的斟酌，作者对协助者的素质技能提出了细致入微的指导。可以说，这本积累了老一辈发展工作者心血与实践历程的厚重工具书不仅是年轻发展实践者的巨大知识财富，更凝聚着对后辈学生为实现中国农村发展而不懈努力的殷切期望。

在关注中国农村发展实践的同时，我们也要对中国的“发展”与“发展研究”保持清醒的认识与反思。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和力量影响着思想界的意识潮流与知识生产，更具体地型塑着学术机构对社会的关注方式与关注客体。在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正面临着被简化为“发展实践”的危险（Thomas 2000）<sup>①</sup>。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研究所围绕和灌输的是一种“刻意而为”的发展（Cowen and Shenton 1996）<sup>②</sup>，因此发展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被等同于为发展实践生产提供应用性的知识。当“发展”从一个人类社会所向往的美好图景变成了现代社会中一项分工明确的产业，发展研究是迎合这种全球范围内快捷的、应用知识（更确切地说是应用“工具”）的生产潮流，还是保留和发扬老一辈学者在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中统怀社会、探寻历史的知识传统？这是任何一个发展研究

① Thomas, Alan. 2000. Development as Practice in A Liberal Capitalist Worl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2): 773 - 787.

② Cowen, Michael and Shenton, Bob. 1996. *Doctrines of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者在界定自己的专业取向时必须做出的严肃抉择。只有不断坚定发展研究的学术底蕴，我们才有可能以超越“参与式”的思想与知识成果服务于农村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最后，还想特别说明的是，作为李鸥教授新作的序言，或许应该论述参与式发展方法的各种优势和作用，在此提出对参与式发展的一些反思，似乎显得既不应景，也不应情。但这样做，确是因为深受老一辈社会科学家严谨学术作风的启发，也深受李鸥教授多年来用心与农民在一起的工作作风的感动，因此，我认真学习了李鸥教授的书稿，边学习边思考，因为我坚信，阅读任何一本好书，都应该有自己的思考，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了。即使这样，我还是对上述反思存有一种担心，因为这本书的对象主要是学生、学员和项目工作人员，是目前或今后从事发展实践的一线人员，而他们需要的恰恰是参与式发展理念，尤其是发展实践与项目工作的方法；需要的正是对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式发展工作方法的弊端和错误的认识，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自己的发展实践与农村工作中充分践行平等、参与、自由、民主、公平和正义的发展思想和价值观。但是，在还没开始学习李鸥教授书中的这些参与式方法与技能之前，就读到这么多的反思，年轻的发展后备军们会不会产生先入为主的抵触呢？会不会因此而失去为“唤醒公民权利意识、培育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而奋斗的信念与激情呢？这肯定不是李鸥教授所希望的，更不是我所愿意看到的。恰恰相反，我坚信，带着这样的反思，工作在一线的发展实践者一定可以更好地运用这些方法与技巧，并努力实现突破和超越。在过去近20年的农村发展工作中，李鸥教授就是这样做的，例如，他在参与式发展工作框架和工作步骤中，更加强调了参与式发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强调了参与群体的异质性；强调了通过协商达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平衡和共识的机制；强调了参与过程的互动性，而不是一次性的图表和结果的展示；更加强调了组织的作用，而不只是原子化个体的参与。我相信，真正带着一种价值与追求而从事发展的实践者一定会悟出这其中的味道来。

2010年6月8日于中国农业大学

## 前 言

本书的前身是笔者基于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近 10 年的实践、于 2002 年编写的《发展研究方法》讲义和自 2008 年以来在前者基础上改编的《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方法》讲义。前者主要是为农村区域发展专业本科生讲授，也为硕士研究生同名的高级课程所参考，其中的有关概念、方法和案例还被大量地应用于众多国际组织在华项目进行的参与式途径与方法培训。而《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方法》则扩展到城市规划和社会学专业的本科生；在突出课程的实用性、培养学生作为协助者（Facilitator）促进对组织、社区或社会发展变革的应有意识与能力的同时，增加了笔者对国际上参与式理念与方法进展的关注和与我国改革发展实际需要的进一步结合，以及自己在相应领域新的应用案例。

此次正式出版采用的书名是《参与式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在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及组织发育中的应用（学生/学员/项目工作者用书）》。一方面是因为书中讲的主要是以社区为基础、通过“赋权”过程使社区、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妇女成为发展主体的参与式、行动性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和其他学科对发展进行研究的经典方法不同，以《发展研究方法》作为书名容易引起误解；另一方面，这里介绍的方法主要用于社区或组织的发展规划与管理，以及项目从规划、实施到管理、监测评估的全过程。读者是学生、培训班学员和项目工作者，主要包括今后可能或已经在从事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大学生、研究生、各类项目人员或社区工作者。强调了内容的实用和可操作性，理论和概念也选用了

最相关的，能使读者理解、认同并能与实际相结合的。因此增加了副标题，并注明是“学生/学员/项目工作者用书”，专门供他们在学习、培训和项目实际工作中参考、使用。如果需要考研、通过职业资格考试或者进行学术性研究，则还得阅读其他教材、书籍；书中列了一些可以参考的文献。此外，笔者还准备编写本教材的“教师/培训师/发展研究人员用书”，为使用本书的教师、培训者、发展研究人员或咨询专家，提供更多的理论、文献背景和工具、方法的应用案例。

这次改编进一步跟上了国际上参与式理论和概念的发展，如公民（权责）参与（Citizenship Participation）等；突出了协助者（或协助师，Facilitator）在促进社区或社会发展变革及组织发育中的重要作用，社会发展对这种人才的客观需求，以及他们应有的意识、能力和技能；系统地总结了2000年以来笔者采用参与式研究与实践方法在发展与管理及组织发育中的应用与创新，介绍了得到项目资助方、执行单位和项目社区、群众肯定和认可的做法和经验。涉及的领域和方法除了在《发展研究方法（讲义）》中介绍过的参与式扶贫开发规划、参与式土地利用规划、农户经营系统研究等以外，又进一步完善了将参与式评估/调研系统框架的各步成果与以目标为导向的计划制订法及其逻辑框架（Logframe）相整合的简化创新，并扩展或增加了社区主导型发展（CDD,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及参与式的新农村建设“十步工作法”，项目的社会评估及少数民族社会评价与发展计划制订，农民用水户协会、专业合作组织、社区发展/扶贫基金等农民自助组织的发育与管理，社区为基础的（草地）资源管理与体制发育，参与式、行动性研究在以上组织和机制发育中的应用，参与式监测评估与影响评价，参与式规划和管理在城市/社区规划与治理中的应用等。此外，还特别增加了参与式方法在改进政府部门等组织的管理与绩效中的应用，为年轻学子们增加对组织进行“建设性引导”<sup>①</sup>的技能，以适应更广泛的就业需求。

参与式的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或者称作发展与项目的规划和管理方法）与其说是科学，不如说更多的是艺术。在这方面的水平、造诣不仅要

---

① 胡继旋：《稳泰建导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靠学习有关的教材、专著，更要靠实际操作和经验积累，即所谓“在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特别是努力与当地实际及工作需要相结合的事业心、正确态度和能力。为了缩短读者，特别是在校生理解和基本掌握、运用的过程，本书介绍了大量案例，绝大多数是笔者自己实地调研、访谈，主持或协助当地群众采用参与式工具进行研究、分析、讨论、决策完成的。在介绍工具、方法的案例时，通过描述当时的过程、实景，尽可能地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就像过去的师傅作示范、带徒弟那样，并从中体会发展工作者应有的理念、态度和行为。主要选择、收录自己做的案例，正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如果参考本教材及后续教学用书的教师、培训师能够选用自己的实践案例讲课，效果一定会更好。多数章节推荐了阅读思考或小组讨论和练习的题目，使学生或学员们能够结合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兴趣，通过实际演练“在干中学”，具体领会或运用、掌握有关的概念、方法和工具，同时培养和锻炼从事发展与项目工作所需要的团队意识与能力，增强自己开展社区、群众实际工作的信心。此外还设计了农村实习的大纲，供教学、培训的实习环节参考、使用。

本书保留的2002年自编讲义前言，反映了笔者当时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未来变化及其呼唤新兴的发展学科与研究、实践方法以及人才的认识。现在看来，基本上还不过时，保留下来与现在或未来的同行们分享，也作为自己思想轨迹的一个记录。

编著者

2009年10月 于三亚

## 自编讲义（2002年）前言

人们说 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是因为世界公认中国在 21 世纪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会造福于中国人民，也将极大地促进世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这种变化发生得最为剧烈、最为深刻、最为壮观的将是中国的农村。这可能反映在以下方面。

——农业的产业结构，随着中国进入 WTO、融入国际农产品的大市场，将由粗放型、靠简单劳动为主、商品率很低的农产品生产结构，转变为劳动力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相结合，专业化和兼营相结合，绿色生态型、种类和品种多样化的商品性生产结构，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众多、农民勤劳思变、地域广阔、生物资源和自然条件的多样性极为丰富的优势。

——农村的产业和人口结构中，随着农业产业结构变化和农村人口收入增长，农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和居住在乡村的人口所占份额将越来越少，第二、三产业及其从业人员和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将占到多数。

——在农村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中，用于物质生产的份额将逐渐减少，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以及环境保护需求的将越来越多，各地农村、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悠久的社会文化资源将得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与保护。

——我国的城乡结构中，在大中城市及其人口发展的同时，农村地区城镇在数量和规模上将得到极大发展，许多不能满足人们现代生活条件的村落将逐步消失。

——我国农村地区的政治结构，也将随着整个国家一起，实现基层高度

自治，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农民将不再以自己的称呼而自卑，而千辛万苦地培养子女、跳出“农”门。农民将成为一个被人们尊重的职业和足以影响各级民意代表和政府官员仕途沉浮的社会阶层。农民也将由一家一户的分散状态，围绕自治、经济、资源的规划和社区发展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或者发展、形成新的组织和机制。

对照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现状，在这个占世界将近20%人口的地区，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但这只是一种可能，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前途、命运，还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我们谁也不愿看到的可能与风险。实现前一种可能、规避后一种风险的重任，就历史性地落在我们大家，特别是立志改变我国农业与农村面貌和农民处境的青年人肩上！

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是相互关联、高度综合和整体性的发展过程，不可能靠传统的教育、科技和行政体制下一个一个的学科、部门相互分离、独立工作去实现，之间要有机地整合；不可能仅仅靠上面定政策、发文件或者写论文、提建议，而要和亿万农民群众的实践紧密结合，在其中探索、发现、尝试、检验、改进、完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不可能靠实践者个人去孤军奋战，甚至自己淹没在传统体制和习惯势力之中，成为改革的牺牲品，而要学会团队工作，学会适应环境、调整自己的策略。所有这些，在传统的中国都是全新的领域，呼唤着发展新兴的学科、培养新型的人才，去研究、去实践，这也正是农村发展学科和区域农村发展专业形成和建立的历史依据，是从事这门学科、专业人员的使命所在。

发展学科在国际上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与人才需求。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据统计，仅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从事国际援助的外国发展工作者或咨询专家就有8万多人（Huizer, 1989）。而现在在国际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中从事发展中国家援助工作的人不下数十万。尽管其中多数是专业技术人员，但也越来越要求他/她们懂得发展学科的概念、途径和方法。例如，对于其中著名的参与式农村评估（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的人才需求，我们在去年11月份搜索“谷歌”（Google）的求职功能（Job）时，就找到了4040个网站或网页含有这个主题词。十分遗憾的是，在这一巨大

的人才市场中，中国人的面孔还极少极少，远远不能和我们在世界上所占的人口比例相符。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农村发展学科在研究、教育和咨询领域的发展，人才市场的全球化，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也会越来越多地走向国际。

。 区域农村发展的课程体系中包括了发展理论、研究方法、发展管理和专题/实践四大类，从中可以看到发展研究方法在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作为编者，我们充分理解到自己的责任。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教学相长”。我们将不仅要和国内外的同行们交流、相互学习，还特别要和区域农村发展专业的同学们共同努力，在把这门课程教好、学习好的同时，不断地对教材内容加以补充、改进和完善，并在本书的下一版中得到体现。

编 者

2002年5月 北京